

新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预告

——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演侧评(上)

王 丽 丽

将陈寅恪和钱锺书并置研究也是一次比较文学研究的娴熟实验。王德威引入同一时代的多位西方学者在不同的危机时刻所作的文学或文化论述作为对照，再一次检验中国文论加入世界知识体系的流转对话并做出独特贡献的潜能。

重新定义“文论”

王德威将自己的讲演冠以“现代中国文论刍议”这一总标题，是为了向整整一百年之前北大教授胡适(1891—1962)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名文《文学改良刍议》致敬。众所周知，它与陈独秀(1879—1942)随后发表在同一杂志上的言辞更加激烈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一道，揭开了白话文学革命的序幕。

王德威将“文论”一词注译为“Literary Thought”，明显区分于“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与“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这一点颇引人注目，因为这与国内文艺学学科对“文论”这一名词的习惯理解明显不同。在国内的惯常理解中，“文论”亦即“文学理论”、或者至多是“文艺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的简称，单

2017 年 10 月 15—26 日，受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邀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第五届“胡适人文讲座”。新世纪以来，王德威教授的每一次学术演讲总

是能够激起国内学界的很大反响，其提出的学术议题经常成为其后几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或者学者讨论的焦点。此次系列讲座以“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为总题，下分四讲。《文汇报》分两期刊发。

就文学一种艺术形式而论，“文论”与“文学理论”并没有任何区别。但显然“文论”一词对王德威而言却别有所指。

早在1934年10月，当朱自清先生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撰写书评的时候，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了当时学术界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选择中国的问题”。王德威显然是想以“文论”(Literary Thought)、直译为“文学思想”来特别意指中国传统本有的对“文”的思考和论述，而中国传统“文”的涵义，也远

远超出西方近代的“文学”(Literature)这一概念，它既可以是“文饰符号”“文章学问”“文艺书写”，也指称“文化气质”和“文明传承”。

顺着这一脉络，现代的中国作家和读者对“文学”的理解，也就不仅仅是简单依循西方的模拟与再现(representation)观念，而是倾向于将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世界做出有机连锁，并且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持续铭刻、解读生命自然的过程，一个发源于内心并在世界上寻求多样“彰显”(manifestation)形式的

过程。

与此广义之“文”相对应，中国的“文论”，也就自然呈现为“不同体裁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本”，用以“解释文学在文明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描述文学和文学作品在思想和社会生活领域引起的回响”。

如果说西方专门的“文学”之“理论”逻辑严整、形式统一，那么中国宽泛的“文”之“论述”其相应的实践形式则表现出更多的随机性和多样不拘。正如王德威所言，中国文论常常以“信件、序言、讲演……政论”甚至虚构性写作等种种方式，串联“作者、文本、世界、读者”各个领域，形成独树一帜的论述。但另一方面，相较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学科自足性和学院限制，中国文论也显示出更强的参与性和媒介性。因此，着眼于自己长期致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身兼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的王德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如现代，从鲁迅的杂文到王国维的词话，从梁启超的演说到梁宗岱的随笔、沈

从文的“抽屉里的文学”，中国文论所显示的随机性、多样性以及衍生的政治、伦理、审美关系如此生动繁复，西方学院的理论模式或传播方法(期刊、专书、会议)难以相提并论。

王德威对“文论”的定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文学作品具有思想深度的阐释和论述，加上他对“文论”参与性和媒介性的强调，表现出了他试图坚持西方“理论”(Theory)全面介入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又同时不失去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专业立足点的学术抱负。

重新定义“文论”，隐约也透露出了王德威意图重新撰写不唯“西方观念”马首是瞻、更加“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史的学术雄心。这一点，正如他所套用的胡适“刍议”这一低调的用词一样，“刍议”或许是当年性情相对温和的胡适“谦虚”的表示，但当我们回首百年前胡适所揭橥的文学改良“八事”及其

(下转 13 版) ➡

➡ (上接 11 版)

作很是关心，而我在工作中若发现他感兴趣的事情也会告诉他。如1987年我写过《〈宋稗类抄〉作者、版本考辨》一文，认为该书的作者是李宗孔而非潘永因，这是他先前研究《西厢记演剧》连带考证李宗孔时未及注意者。又如2003年我应邀赴美撰写《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发现臧懋循删订汤显祖所撰四种传奇的书名应为“玉茗新词四种”，柏克莱藏本尚保留着万历四十六年臧氏雕虫馆刻本的书名叶。之所以称作“新词”，是臧氏强调由于通过自己的改编，方便汤氏《还魂记》等四种案头之曲变为场上之曲。今人不知有此名称，各家书目著录为“玉茗堂四种传奇”者，或据失却书名叶之后印本，或为后来翻刻者的自题书名，不能确切反映臧氏改编面貌。星煜丈于此亦首次听说，便勉励道：“版本目

录确实重要，依能将古籍目录编成这样，也勿容易。”此外，我编撰过的几种书，印象中他都写过介绍文章，而事先我皆一无所知，之后看到殊为感动，一直将这份长者爱护后学之深情厚意视作工作动力。

他曾想和某出版社编辑合作编纂一部《西厢记》的版画集，这是他全面研究《西厢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未悉何因中辍。由于有些图片是我协助采集，他便提出以我的名义编纂。我知道他是为了帮我，至少多一项成果有利于职称评定。可这是他的专门，我岂能染指。我对他说，将来有可能的话，就以上图所藏稀见明刻本《西厢记》版画结集出版，规模虽小，但在可控范围，容易成功。机会终于来了，1999年，上图欲选馆藏精品制作高档礼品书，我便申报了明刻本《西厢记》版画的选题，以上海图书馆编纂的名义，

请星煜丈撰写鉴赏文字，线装出版。领导马上同意，并纳入馆属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当年出版计划。星煜丈十分高兴，将此书定名为“西厢俚影集”；书名请龚学平先生题署，我担任责任编辑。该书一函两册，就当时的印制水平，堪称精良，图文双美，大受欢迎，印数无多，转瞬即成稀罕之物。

2012年，我们又有过一次合作，上图要影印乾隆御览之本《江流记》《进瓜记》，出版前言之撰写非星煜丈莫属。5月初我上门相请，他一口答应。保姆悄悄对我说，老人家近来健康欠佳，已有较长日子闭门谢客，电话也不让接听。我闻之惶恐不安，谓可俟康复后再动笔，他连说勿要紧，勿要紧。不数日接到他来稿，曰“文章乃急就，外来应酬，已一概谢绝，精力不济也。阁下嘱托，自当全力以赴，但极其不理想。想你们修正。实在不行，另请高明亦可”。我立即将其手稿整理成电脑文

本，并稍作改动，呈其审阅。之后于5月中下旬又三度书信往返，遂成定稿。迨至7月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我想到上图的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尚无星煜丈的墨宝，便将其前言手稿及连同给我的四通相关信札捐给了手稿馆。

他知道后，表示要将一批文化界人士给他的信件捐给上图。2013年5月28日，星煜丈将四十余位文化、戏曲界人士共两百余通信札捐赠上图文化名人手稿馆。之前特地招我到其府上一同挑选，除有涉及写信者的个人隐私不宜捐赠者外，哪怕有对其学问提出不同意见及批评者，皆不作保留，全部捐献。他于不少信件，或对撰写者作了特别的介绍，如称徐朔方先生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十二万分坦率。任何事情绝不顾情面，一概秉公处理。两次纠正我的错误。我认为我们的相处在当代学术界是少见的”；或提示信的文献价值

不能忽略，如于卢豫冬先生之札，谓“彼此一直联系，到他逝世。信三件，内有左翼剧联重要史料”。其坦荡、认真有如是者。同时他还捐赠了一迭手稿，带有歉意地说：“过去随写随扔，未及处理的稿子被档案馆要去，就剩这点了，以后会给上图留着。”然而，再也没有以后了，惜哉。

星煜丈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上图所藏清初朱素臣校刻《西厢记演剧》这部孤本能够影印出版，这是他研究《西厢记》的一大发现，惜皆以各种原因无果。我去六院探望时，向他表示会继续想办法出版此书，他说现在没精力写前言了，我说可以用发表过的论文代序。窃以为，书是有魂的，要在识与不识。现在他走了，书魂也被勾走了，留下的，是我对长者无尽的思念。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